

新冠疫情和生产经营

Fritz Hofmann, 2021年9月4日

2020年在联邦政府宣布应对新冠危机的措施后不久，情况变得很清楚：工业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而学校与各类休闲、体育活动，旅游业、餐馆、酒店、商店、理发店等却不得不停业。

整个汽车行业及其供应商、化工和其他行业、食品行业、所有建筑工地等都能够继续运行。在我居住的市，发生了以下荒谬的事：消防车穿过居民区，广播呼吁大家，“请呆在家里！请即刻回家！”。与此同时，数千人却继续在街道另一边的大型化工厂工作。为什么待在公园里要比在工厂工作更有感染力呢？

事实上，在2019年，甚至新冠疫情之前，一些公司已经遭遇了经营困难，并向政府登记了短时工作制（在短时工作制中，雇员的工作时间暂时减少，由此损失的工资收入由社会保障部分补偿——参见2020年10月19日Bodo Zeuner的《短时工作制》一文）。当然，在新冠疫情期间，此种情况更甚。即使到今天，因为供应链的问题，不少公司的运营依然存在问题。或是因为公司出现新冠病例，被迫停业。

当然，危机中也有赢家：大物流集团、互联网贸易、超市。即使在那里，工人们的工作压力也随着营业额的上升而水涨船高。而医院、养老院和疗养院的护工工作压力也在不可估量地增加。

短时工作制的广泛实施

尽管2020年经济出现了巨大的滑坡，但失业率并没有达到破纪录的水平。短时工作制可以避免工厂在订单暂时下降的情况下裁员，并被使用了数百万次。

大多数的短时工作制是在餐饮酒店业施行，因为疫情不得不停业。但短期工作制会导致贫穷的风险。例如，在餐饮酒店业，本已很低的工资在短时工作期间进一步减少，社会保险额外支付很少，而且没有雇主发放的额外福利。

这一点适用于所有低工资行业，特别是服务业、租赁业以及临时工或小时工。

居家办公

从本质上讲，国家对还在运转的企业有两个方面的干预。

- 要求尽可能让员工在家工作（居家办公）。
- 要求遵循普遍的防疫措施。

这在各家企业的实施情况非常不同。且非常依赖于职工委员会的积极干预--如果有的话。

2019年，4%的员工在工作场所以外工作；在第一波新冠疫情中，这一数字为27%，而在2020年1月，又达到了24%。很多时候，为了不感染新冠或顺便照顾孩子，员工被鼓励进行居家办公。毕竟，托儿所和小学都关闭了。然而，在家里办公加上照顾孩子，会导致所有参与其中的人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

特别是当上级认为员工不在老板的直接控制之下时，员工就会偷懒，这时就会出现冲突。而与此同时，许多老板也认识到，居家工作甚至可以节约企业支出和带来灵活性。可许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如何记录和限制工时，工作环境缺失问题，如何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和职工委员会的共同决定权等。

新冠的防护措施

大公司率先实施了各种防护措施。分发防护面罩，摆放消毒液，关闭餐厅。这些都是非常经济的措施。

在约三分之一的公司中，采取的技术和组织措施是比较昂贵的。例如，引入额外的班次以平衡工作量，从而使同一时间在生产线上的人数减少；新的交接班方式：尽量避免多人聚集，比如开会；进行感染链追溯等。而职工委员会的力量和干预在这种措施的设计和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新冠疫情开始时，也是工人抗议迫使企业采取防疫措施，比如在 Wörth 的戴姆勒卡车工厂。在意大利，罢工之后，政府要求所有非必要的工厂停工。而在德国却没有类似的举措。

不应忘记在德国也有许多公司没有实施相应的防疫举措，这些公司往往组织状况糟糕，没有职工委员会。最典型的就是肉类加工业，其丑闻甚至促使了法规的修改（见 2020 年 10 月 19 日德国新冠疫情和就业系列中 Bodo Zeuner 的文章《肉类加工业和通尼斯公司》）。

现在联邦政府规定，公司必须为员工提供每周两次病毒检测。而且，必须给员工放假来接种疫苗。这样的事情就必须首先由联邦政府来决定，最初甚至遭到企业界的抵制，这表明防疫措施在企业里不被重视。

系统攸关性

新冠疫情中，人们注意到护士、超市售货员或包裹承运人对社会的存续是不可缺少的（“系统攸关”）。然而，他们却处于薪资阶梯的底端。而那些处于薪资阶梯高位的人虽然工资很高，但基本上没有什么用。

工会利用这一优势，在 2020 年的公共服务部门的劳资谈判中取得了进展，使得工资收入增幅高于平均水平。

医院里的劳资斗争仍在继续。毕竟我们离可接受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还很远，医疗卫生行业正是如此。

新冠疫情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DATENREPORT 2021

在德国，新冠疫情使得摆脱贫困更加困难。这是联邦统计局与两个研究机构合作进行的一项研究的结论。



汉堡的无家可归者和有困难的人正在领取救济食物的发放

该项研究的数据报告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新冠疫情并未让人们更加平等，而是使他们的生活状况更加不平等。许多人在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得到了学者们的初步分析后的统计数据的印证。

那些滑落到贫困线以下的人发现越来越难以增加收入。在所有贫困人口中，长期处于贫困风险的人的比例现在是 44%。这是 90 年代末的两倍。单亲父母、低技能者和有移民背景的人尤其受到影响。

数据还显示，高收入者更为经常出现收入减少，但低收入者的财务忧虑显然要大得多。几乎五分之一的受访者称在 2020 年 3 月底至 7 月初期间出现了财务困难，即他们不再有能力偿还贷款。在技术工人、技师和有资质的白领职业中，这一比例明显较低，约为 9%。

单亲父母报告的经济问题最多

单亲家庭（25%）报告的财务问题最多，而夫妻家庭中只有 6%。自营职业者是第二大出现财务问题的人群（20%）。此外，还有小微工作就业者，其中大多数是妇女，还不能领取短时工作制的补贴或失业金。

对居家办公的调查证实了这种社会差异。收入较高的三分之一受访者中的近三分之二，居家办公的份额在 2020 年春的封锁中至少为 20%。包括许多“抗疫英雄”在内的收入后三分之一人群中，大约一半人的工作，居家办公的份额不到 6%。在教育方面也存在差异：即使在新冠疫情之前，社会背景对受教育机会均等的影响是一个一直争论的话题。就家庭教育而言，在设备数量上也是显而易见的。报告显示，月收入在 5000 至 18000 欧元的家

庭有四台电脑，月收入低于 2000 欧元的家庭平均只有两台。



因为学生居家上学而空置的教室

"令人沮丧的结果"

联邦公民教育机构主席托马斯-克吕格称这一结果令人沮丧。克吕格说，新冠疫情并没有像一开始大家以为的那样，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他说，相反，社会出身的影响才是决定性的。

该数据报告还显示了民众对高度社会不平等的反应。只有不到一半的人仍然认为自己的总收入是公平的。大多数人认为低工资不公平。而且，大多数人现在要求国家能对此有所作为：四分之三的西德人希望采取更多措施来缩小收入不平等；相比 2002 年，支持者的比例还不到受访者的一半。在东德，这一数字则约为 80%。

定期公布的数据报告由联邦统计局、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和联邦人口研究所与社会经济小组合作定期出版。该报告统计关于生活水平状况的基本信息，今年还提供了有关新冠疫情进展的一系列信息。

HF/GRI (RTR, DPA, AFP, KNA, EPD)